

〔第9册〕

白化文◆主编

中國近現代曆史名人軼事集成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第9册〕

白化文◆主编

中國近現代曆史名人軼事集成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 . 第 9 册 / 白化文主编 .
— 济南 : 山东人民出版社 , 2015.5

ISBN 978-7-209-08894-7

I. ①中… II. ①白… III. ①名人 - 生平事迹 - 中国
- 近现代 IV. ①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9624 号

责任编辑：王路

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 . 第 9 册

白化文 主编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市场部：(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 开 (185mm × 260mm)

印 张 40.5

字 数 8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8894-7

定 价 40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 (010) 57572860



序 言

历史人物轶事，作为中国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自汉代起，在各类书志中就有载录，特别是魏晋时期，品评、臧否人物之风盛行民间及士大夫阶层，此类著述更是蓬勃发展。到了明清，特别是近代，数量更是剧增，品种也颇繁杂，渐渐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突出现象，又因为其特殊的趣味性而有了更多的读者。

所谓“轶事”，是指“正史”之外各类野史笔记、稗乘杂史、家史家书和名人书信中有关历史人物的事迹。而历朝历代，都有一些文人对其加以搜集整理，有的学者更有浓厚兴趣对其进行研究、撰述，给这类轶事构建了进一步传播的路径，也为“正史”研究者拓展了视野。有的轶事，甚至被民间的大鼓、评书艺人改编，被写进“演义”“话本”中，得到了更多的传播。

做研究的人往往深有体会，当想利用“正史”写文章时，所谓“正史”里却提供不出具体且有价值的东西；当不用它时，觉得又很有价值。所以，历代常有许多学问家，很看重野史和家史的价值，特别是各类名人“轶事”，从中去粗取精，可以加深对有关历史人物的了解和认识，有利于拓展认知的广度与深度。所以明代大学问家王世贞才有关于正史、野史和家史的一段辩证的观点，他认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王世贞的观点很切实际，一方面，他认为对正史、野史、家史的得失应做综合评价，不要孤立地看问题；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对野史本身应辩证地对待，以免陷于偏颇。他的观点，事实上也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

《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正是得益于这些野史和家史（当然也有其他著述），所收录的近现代名人范围较广，既有晚清的维新人士、革命志士、文人学士、杰出妇女，还有官僚政客、军阀流氓、商人巨贾，甚至还有宫廷太监，等等，可谓集大成者。由于内容多不见于正史，故可以从一些侧面补正史的许多不足。

《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一切从史料出发，从近现代出版的各类书刊、报纸中辑录、编排而成，既是一部学术资料，又是一部大众读物，既适用于专家学者做研究时参考、利用，也适合普通文史爱好者的休闲阅读。相信各阶层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阅读的乐趣，从这些历史名人轶事中，发现、揭秘人性的善美和丑恶，体会社会的风云变幻，感悟人间的世事沧桑。

《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编委会

2015年3月12日于北京

凡 例

《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是一套大型史料类工具书。丛书共分为十册，收录了一八四〇年以来，一九四九年以前，活跃于近现代历史时期各个领域的人物近四百人，轶事四万余则，总计约八百万字。

丛书所收人物，包括政治、文化、学术、思想、艺术、教育、实业、社会等各个领域，而以政治、文化、学术等各领域为宏。

丛书以人物出生年月为序，次第分册，各人独立分卷。同年出生的，则以政治、文化、学术、思想、艺术、教育、实业、社会等领域排序。每位人物的各类轶事，依照其生平事迹，次第辑录。

丛书各卷基本由“小传”“正文”等两部分组成。“小传”即传主一生主要事迹之载记及相关成就之述评，短短几百字，使读者迅即明了传主之生平事迹、事业成就、历史地位等。“正文”即传主一生轶事之系统辑录。

丛书史料性、趣味性并重，力求使读者一册在手，概得其全。各卷少则数十条，多则数百条，力求于有限之史料内，展现传主多彩之人生。所引文献，均为“当事人”记“当时事”，所谓“于史有征”“于事有信”者也。后生晚学之研究性著述，不入征引范围。所据文献，多为一手资料；也有个别生僻条目，系据他书而转引。

丛书卷帙浩繁，征引文献出于异时异地之多人之手，个人政治立场、视角维度不同，对事件、人物之臧否或有差异，为重史料原貌故，未作修改，以合乎今人之观点，特此说明；如作征引阐述时，需斟酌使用。另外，同一人名、同一地名等，各人记述略有小异。如鲁迅，或作“周树人”，或作“树人”，或作“周豫才”，或作“豫才”。

等；北京，或作“京”，或作“京师”，或作“北平”，或作“平”等。文中各存其真，并不强求统一。明显之错字、别字、衍字、衍句、缺字缺词等，则径自补正；不再另出校记。

目 录

序 言	001
凡 例	001
胡 适卷 (1891—1962)	001
李宗仁卷 (1891—1969)	095
张自忠卷 (1891—1940)	117
陈璧君卷 (1891—1959)	124
陶行知卷 (1891—1946)	133
陈衡哲卷 (1891—1976)	212
陈果夫卷 (1892—1951)	220
陈公博卷 (1892—1946)	234
郭沫若卷 (1892—1978)	254

白崇禧卷 (1893—1966)	256
梁漱溟卷 (1893—1988)	261
卢作孚卷 (1893—1952)	286
宋庆龄卷 (1893—1981)	312
杨虎城卷 (1893—1949)	315
汤用彤卷 (1893—1964)	318
晏阳初卷 (1893—1990)	322
张资平卷 (1893—1959)	324
梅兰芳卷 (1894—1961)	326
宋子文卷 (1894—1971)	334
吴宓卷 (1894—1978)	345
许地山卷 (1894—1941)	348
吴湖帆卷 (1894—1968)	351
范烟桥卷 (1894—1967)	360
吉鸿昌卷 (1895—1934)	364
邹韬奋卷 (1895—1944)	367
黄绍竑卷 (1895—1966)	382
卢汉卷 (1895—1974)	410
林语堂卷 (1895—1976)	443
徐悲鸿卷 (1895—1953)	466

张恨水卷 (1895 — 1967)	477
冯友兰卷 (1895 — 1990)	486
周瘦鹃卷 (1895 — 1968)	489
郑逸梅卷 (1895 — 1992)	504
徐志摩卷 (1896 — 1931)	514
郁达夫卷 (1896 — 1945)	528
胡宗南卷 (1896 — 1962)	536
傅斯年卷 (1896 — 1950)	539
溥 儒卷 (1896 — 1963)	543
刘海粟卷 (1896 — 1994)	552
戴 笠卷 (1897 — 1946)	554

胡适卷（1891—1962）

胡适，汉族，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糜，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著有《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藏晖室札记》《四十自述》《胡适选集》《胡适手稿》等。

勤工俭学

中国公学为留日生多人，愤日文部之取缔华籍学生，归而组立，嗣以国人鲜援助，经费陷窘乡，教职员中激烈者，至自杀以励同俦！胡在校颇见器于师友，第伊时其家商业正坏，费用供给亦难，胡因助教英文，兼编校刊一种，藉资自赡，其以文艺为生涯，盖由兹始。

（坦荡斋主：《现代中国名人外史》）

翩翩年少

自新文学运动后，胡适之名大起；杜威博士来华时，胡博士更为全国人士注目矣。时人有云：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成名；杜威来华，胡博士声价十倍。语虽稍近滑稽，但此中亦不无小小道理也。胡氏寄居北京时，生活甚裕，年三十，固一翩翩少年也。有某女士在美国时即闻胡之大名，来华后，颇欲一睹胡氏风采，乃托郭泰氏之介绍，郭氏慨然允诺。一日郭偕美女士诣胡宅，胡衣中国装招待，笑容满面，体态轻盈，望之俨有梅博士之风度。郭氏当为之介绍，美女士惊奇者久之，笑曰：“我以为胡先生是一个白头发的老博士，不知尚如此翩翩年少也。”至今道及，胡氏犹洋洋有喜色。又胡氏曾赠许廉一联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吃盐闻咸吃醋闻酸。”因许时为燕大社会系主任，专研究中国人口问题，此联亦颇饶趣味。

（竹楼主人：《近代名人轶闻》）

名字旁打黑线

胡于《哲学大纲》出版时，寄一册于章太炎先生。封面上书“太炎先生教之”等字。因胡用新符号，所以于“太炎”两字之旁加一黑线——人名符号。章看时，即愤云：“胡适之是什么东西！敢在我的名字旁打此黑线。”后看至下面，书有“胡适敬赠”，也同样有一黑线，遂云“罢了！这也算抵消了”。

（竹楼主人：《近代名人轶闻》）

灯下写稿读书

胡在北平时，每日上午赴文化基金委员会办事，兼往北大教书，下午则忙于应酬，夜深返宅，在灯下写稿读书，天明始睡。胡夫人，性贤淑，乃一遵守旧礼教女子。对胡之深夜喧攘，不但毫无怨言，并且屡恨自己幼年未能在学问上用功，致使胡之学问，不能予以精神上之援助。胡夫人之贤如此，一般摩登女性，闻之能勿愧哉？

（竹楼主人：《近代名人轶闻》）

“打鬼”更是要緊

现在好多报章杂志，都是在批判胡适，“为什么大家都批判起胡适来了”？青年诸君也许要有这样的疑问。这个疑问并不难解答。我们可分作关于批判和关于批判胡适这样两层来说。

关于批判自身，我们知道批判是普遍必需的。我们对于一切的言论都应该普遍使用所谓“批判地接受”这一个态度。能够普遍使用这一个批判的态度，去应接一切的言论，我们才会随时随地注意严正地去取——去了里面所含消极的退步的因素，取出里面所含积极的进步的因素——才不致毫无别择的连毒带药囫囵地吞下，或连毒带药地倒掉。这种批判态度因属普遍的必需，但作日常补品吃的东西，更其必需。因为这样的东西，最易使人受害。而受害的人又必最多为多数人思想上为卫生起见必当将那毒质成分特揭出来，叫人谨防。像胡适的言论，便是一个模范的例子。

胡适言论的毒质，一在于他的思想方法本身，一在于应用那种思想方法在国家社会的问题上，胡适口口声声说“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说“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敢断言，休想站得住”。其实他的方法是很平庸的。他的方法，就是所

谓实验主义的方法。里面含着以意为之的色彩非常浓，根本不是什么可以把握客观真理的方法。加之他所崇拜的真理论，又是不承认真理是客观地存在的，认为其只是主观地创造的。他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人造出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手里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因为从前这种观念曾经发生功效，故从前的人叫他做真理；因为他的用处至今还在，所以我们还叫他做真理。万一明天发生他种事实，从前的观念不适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们就该去找别的真理来代他了。”他那功利主义的观念论的认识论，也正助长了他的以意为之的气焰，使他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所谓客观的真理。

这种以意为之的方法和态度，假若只用在与实际无大关系的考据问题上，那还可以说与我们的幸福没有直接的关系。例如他为庐山的一个塔做了四千字的考证，有人说他玩物丧志，他就像煞有介事地说：“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一部小说同一部圣经贤传有同等的学问上的地位，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的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虽然那种像煞有介事的态度未免令人难耐，但他总还教人注意问题。从某一意义上说，总还可说是进步的。可是他的这种进步的态度，这种教人注意问题的方法，只有在和我们现在实际没有直接关系的事项上偶然闪现。若在与我们现在实际有直接关系的事项上，例如现在国家社会的问题，他就不再谈什么学问平等，注意问题了。为什么他的态度忽然变了呢？便是因为他怕奋斗，他从功效上看以为奋斗不如妥协投降有功效。所以他觉得“从前的观念不适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们该去找别的真理来代他了”。所以人要谈主义，他就教人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只有他所崇拜的实验主义除外，那还可以选入《文选》叫青年每人都读一遍的）。及至人家要研究问题，他又教人知道那些问题是不成问题的。他教人抹杀问题，逃避现实。即对于眼下日本帝国主义得步进步的侵略，他也教我们不要抵抗，只去依靠那靠不住的国联和美国，他说“我们要对得住国联和美国”。他教我们准备牺牲，他说“我们要准备牺牲，要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他说“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进一步乃至千万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之内一年之内侵略到整个的华北，即令推进到全海岸线，甚至于深入长江流域的内地”还是不要抵抗。据说这是他的“良心”使他这样的。他说“我不能昧着良心出来主张作战”。他教我们等候，教我们无论怎样惨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荼毒，都得静静地等候，他说“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这是怎样荒谬绝伦的鬼话！

胡适自己曾经说：“输入新知识与新思想固是要紧，然而‘打鬼’更是要緊。”而现在却正是他抛却考据不干、历史不编、专谈国家社会问题的时候，正是他毒质放散得最强烈又是每一毒质都足以危害我们社会的健康、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时候。这时

候他的鬼话最多。“‘打鬼’更是要紧”这句话，已经成为仿佛胡适为他自己说了的了。胡适批判风发泉涌地起来，便是为此。

(陈望道：《望道文辑》)

碰钉子

上次胡适南游，应聘讲演，乃因发言不得要人欢，大受奚落，讲演之约为之取消，几至被逐出境。外间传其所不得人欢之言为在香港之演说辞，而其实则其“碰钉子”之真因乃在其面对某人云：“今日中国治国救亡之要图，不在‘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如古人所云；而却在反过来说，文官不怕死，武官不爱钱……”并有所申明，遂大遭忌也。

适之“铩羽”北归后，发表南行感想说：“此行得了三种便宜：(一)未行之前，有人误会我南下有某种作用，今是非不辩自白；(二)有些人误会我的主张(反对读经等)而青年人并不误会；(三)此次之打击充分证明我未曾落伍，而仍然是站在时代前头。”

胡适所言是否有当，仰祈读者自行判断。

(《东南风》)

不愿正式下海

关于胡适博士做官的传说，一度甚是盛行。经胡适一再打电报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说，“关于我的传说，都是谣言”，但是那些谣言，自非全是空穴来风。犹忆本年三月底，国大开幕之初，听说政府当局曾和胡适数度会谈，蒋主席在国民党临中全会，谦辞作总统候选人时，并对于候选人的资格，发表了五项标准，窥其用意，似即瞩望于胡博士。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经国大通过之后，胡博士曾辟谣似的说，“此种传说已成过去”，其后副总统竞选，亦未参加，在复杂的政治局面里，他颇有自知之明，与其竞选失败，不如落个干净。现在行政院长的担子，是否会落到他的肩上？很是引起各方猜想，论资格、声望及经验，胡适是足够的，他在教育界的地位，可以说是“牌子老”，有蔡元培第二之誉，执教三十年来，桃李满天下，政府高级官员多出其门下，在中国政坛里，有“北大系”之称，胡适可说是当然的幕后主持人，抗战期一度充任驻美大使，在国际政坛中博有佳誉，尤其是美国人，几乎只知道有个胡适，再就是林语堂了。但是具备了这些条件，并不能使他做行政院长，这是很自然的事，实因政治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显然他不是搞政治的人，设若硬把他推上台去，他多半未必搞得，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了。胡博士的友人批评他说：“胡适现在聪明多

了！”起码目前他不会正式下海。

(《新星报》一九四八年五月九日)

自认“逃兵”

胡适校长十七日下午三时出席京北大同学会所筹办之北大五十年校庆大会，并发表沉痛演词。庆祝会于中央研究院礼堂举行，到会校友二百余，礼堂正面悬蔡元培遗像，布置简单，首由胡氏致词。胡氏之报告，一再说明渠如一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胡氏并颂扬前北大校长蒋梦麟民廿年接办北大时，于多灾多难中去旧革新之精神，及其后支撑“九·一八”事变后局面之伟大。而此次又面临灾难，渠本人则已如一逃兵，且称，“乃一不荣誉之逃兵”，声泪俱下，与会者几同声一笑。

(《申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可儿妙论

胡适之留学美国康尼尔大学时，万国学生会尝请其演讲中国婚姻制度，关于盲婚一点颇难措辞，遂发妙论云：“贵国人结婚，男女先事恋爱，恋爱热度达至极点乃共缔姻缘。敝国人结婚，从前多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素未谋面，迨结为夫妻后，始行恋爱，热度逐渐增加。是故贵国人之婚姻是爱情之终也，敝国人之婚姻则爱情之始也。”语意隽永，尤能顾全民族体面不少，适之可儿！

(《东南风》)

胡适的讲演

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之，因应本市法商学院、美国大学妇女会及扶轮社之邀请演讲，于前晚由平来津，下榻六国饭店，昨午十二时在利顺德饭店参加扶轮社聚餐，即席作英文讲演，下午四时又至法商学院讲演《治学的方法》，听讲者除该院学生外，当有女师一师扶轮各校学生，得五百余人。

胡氏讲演，首举希腊龟与兔竞走之故事为喻，称谓吾人治学若具天资，兼能努力，实为理想条件，但人类中之具有天资者终属少数，大半均属于中资，故必须取得治学之门径，始不致很费精力，昔英学者培根讲治学有三譬喻：一为蚂蚁的方法，徒知尽量采取，而不知其用，是谓之学而不思；二为蜘蛛的方法，全凭个人之思想，织成天

经地纬之网，看去虽亦成系统，但仅属形式，与实际毫不相谋，是谓之思而不学；三为蜜蜂之方法，蜜蜂努力寻找最好最精之材料，经过自己之手足，而制成蜜，是实为理想上治学之方法。

但仅知方法尚不足以言治学，尤有不可少之条件：（一）工具的积存，如文字的工具，各种科学基础知识等，盖工具充分知识宏博，然后始可广征多取，对学问有新发明新贡献。（二）习惯的养成，治学必要勤快，不苟且虚心无成见，始可有新发现。（三）选择材料，要着眼实物，治自然科学如此，治社会科学历史文学亦应如此，诸君习政习法，尤宜取社会之实际问题云云。

晚九时在新学书院礼堂讲演《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因听众多外国妇女，故用英文讲述，内容为近百年来中国旧社会渐次没落，新社会长成，对中国妇女方面之变迁，引述尤详，趣味横生，至十时许始散，胡氏定今日返平。

据胡氏谈称，翁文灏病状，现虽渐入平安，但性情烦躁，语言不便，恐于被撞时神经因震动过巨受伤，已由在平之友人延请协和医院脑系科医士关松涛前往诊视，于日内将由杭移沪，以便施行X光线检查诊疗。

又谈及最近中央查禁新书事，据胡氏称，此项措施，未免太笨，因凡经查禁或焚毁之书籍，反愈使人好奇想看。阶级斗争，固为吾人所反对，惟同情于贫富悬殊，民生疾苦及民族运动之作品，原出于好的理想。最近上海摄制之影片《盐潮》内容甚佳，亦以含有挑拨阶级斗争性质，已被禁演，设以此项标准概括之，则杜甫诗集中之“朱门酒肉臭，野有饿死骨”亦应予以挖出。自唐宋以后，中国诗词中，描写民间疾苦者甚多，亦实为中国旧诗中具有价值之一部，查禁焚毁之办法，实非所宜云云。

（《大公报》一九三四年三月九日）

文苑俊才誉“大哥”

适之绰号“胡大哥”并非偶然。梁漱溟多骨，胡适之多肉；梁漱溟庄严，胡适之豪迈；梁漱溟应入儒林，胡适之应入文苑。学者也好，文苑也好，但适之是绝不能作隐士的。一人性格，大概难于分类，也大可不必分类。我想六分学者，四分才子，二分盎格罗撒克逊留学生，约略可以尽之。也许加了三分学究气，减了三分才子气，适之应酬可以少一点，学术著作可以丰富一点，但如此便少了一团蔼然可亲之气，而不称其为胡大哥了。这却何苦来！这一股才子气，又被他六分的学究气压下，所以若称之为“风流才子”也不甚适用，因为他的立身行世，也颇谨严，如对冬秀之始终如一，便可看出。然而适之对女子，又不是像漱溟、雨生那样一副面孔。在女子前献殷勤，打招呼，入其室，必致候夫人，这是许多学者所不会而是适之的特长。见女生衣薄，

必下讲台关课室窗户，这是适之的温柔处，但是也不超过盎格罗撒克逊所谓“绅士”的范围。用这种体贴温柔于同辈及少辈，“胡大哥”之名便成了。

适之为人好交，又善尽主谊。近来他米粮库的住宅，在星期日早上，总算公开的了。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余孽、同乡商客、强盗乞丐都进得去，也都可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问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话。到了夜阑人静时，才执笔做他的考证或写他的日记。但是因此，他遂善做上卷书。

今年似是四十四吧？气色虽然不甚红润，不像养尊处优的老爷，但也不像漱溟一般的瘦马相，只有一点青白气色，这大概是他焚膏继晷灯下用工之遗迹。衣服虽不讲究，也不故表名士气。一副相貌，到可以令佳人倾心，天平是那么高，两眼是那么大，光耀照人，毫无阴险气，嘴唇丰满而常带着幽默的踪影。他的悟力极敏，你说上句他已懂到下句了。笑声不是像岂明的低微，是呵呵式的。

适之所以不能成为诗人就是这个缘故。在他呵呵笑的声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们看不见他的魂灵深处。他不像志摩，不会有沉痛的悲哀与热狂的情绪。在那眼光中，我们看出理智的光辉，那兀突不定的嘴唇，也老是闪过机智者会心的微笑。这样是不适合做诗的。所以他的散文，也是清顺明畅，像一泓秋水一般，晶澈可爱，却很少波澜曲折，阐理则有余，抒情则不足。人还是规矩人，所以文也老实。布风说过“文如其人”，正是此意。因此他的思想，也是近于厚重稳健，非近于犀利急进，他的观点是演化的（即所谓历史癖）非革命的（evolutionary, not revolutionary）。在此种地方，最可看出他盎格罗撒克逊的素养。丁在君、胡适之都是这一派思想的好代表，于是“高等华人”的徽号便落在他的身上。在普罗作家，甚至在一切急进派作家眼中，这种绅士气是极讨厌。但是，适之的态度，是极诚恳极负责的。这从他的刊物名称“努力”可以看出来的。他这种态度，使他常傻头傻脑作文章，见要人，向一般急进派所认为根本无望的官僚军阀作劝告，不免太不脱化。然而在这好人极少的中国中，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不甘自弃的好人，而发生爱惜甚至景仰之意。

适之写的英文，似比他的中文漂亮。

（人间世社：《二十今人志》）

历史癖和考据癖

胡适之先生，他是当代提倡语体文学的大家。他在他所著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里面，有一段说道：“我最恨中国史家说什么‘作史笔法’，但我却有点‘历史癖’；我又最恨人家咬文嚼字的评文，但我却又有点‘考据癖’！因为我不幸有点历史癖，故